

我党早期电讯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徐涛

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后,于1927年11月在沪正式建立“特科”,由周恩来主要负责。“特科”先后辖有4个科,分别负责总务、情报、保卫、通讯等工作。建立通讯科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共中央对各苏区与工农红军的联系,及时了解各地斗争情况,指导革命实践。单纯依靠地下交通员传递情报、指示已跟不上斗争形势的发展,筹建秘密无线电台的工作被迅速提上日程。



李强

红色电波出现在上海

1928年10月,周恩来分别与李强、张沈川谈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接受任务后,李强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经营外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发动机以及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刊,一面学习一面摸索,进行收发报机的研制。

张沈川则考入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校。由于勤奋刻苦,他学习了六七个月就上机工作,并且还利用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了敌人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了党组织。代班时,他还利用电台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当敌人发现有人“利用军用电台,私通商报”时,张沈川早已安全撤离。

张沈川与李强会合后,一面学习组装收发报机,一面抄收公开电报,以提高收报技能。1929年7月,李强和张沈川着手试装收发报机,机子的线路图是由李强绘制的。又经过辛勤努力,收报机终于自制成功。10月,经过继续潜心研究,发报机由李强、张沈川自制成功。

在掌握各项技能后,张沈川、李强等人又开办学习班,为党培训了黄尚英等一批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经过不懈努力,他们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我党的第一部秘密无线电台。这个电台的第一本密码是周恩来编制的。

秘密电台的台址在当时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的一栋石库门三层楼房里。电台由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分管报务。电台的天线架设于三楼晒台上和屋脊上,利用各种伪装加以掩护。电台还收抄伯力和旧金山等电台的俄文、英文政治新闻和经济消息,以此练习抄发报的技能。为了练习抄报技能,张沈川等在深夜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呼叫,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答,在和别的业余台短暂通报后,就把天线撤掉。

为了破获秘密电台,国民党特务同上海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在大街

小巷侦察秘密电台的位置。为了能使红色秘密电台继续传播,张沈川和同志们掌握了敌人巡逻的规律,收发报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起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社交往来。

1930年2月,福康里来往人员增多,党组织将电台转移到静安寺路赫德路福德坊1弄32号,随后又在慕尔鸣路兴庆里17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间。

红色电波遍及苏区

1930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电台联络开通后,为了保证安全,中央电台曾多次转移,同时着手筹建中共国际电台。中央电台迁到慕尔鸣路后,上级决定,由毛齐华夫妇兼做掩护人。他们把房间布置得比较阔气,房内摆满了大型时尚家具——收发报机就藏在大衣柜内,电瓶藏在楼板底下。

为了绝对保守秘密,电台工作人员平时和外界断绝往来,需要通信时,则利用高级饭店或医院做通信处。当时电台工作人员常用“东亚大饭店”或“宝隆医院”作为通信地址。因为这种地方都是有权威的人才会入住,国民党特务们不会到这些地方检查信件。在收到大宗文件后,红色秘密电台工作人员为了避开房东、邻居怀疑,一般不会自行带回,而是通过邮局寄回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好转,苏区不断巩固和扩大。为加强对各苏区的指导和联络,1930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从各地抽调16位同志到上海办了一个无线电培训班,挂出“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培训班由李强实际负责,张沈川教报务,陈保礼教机务,吴克坚管组织、财务,方仲如教电学兼管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毛齐华等都是教员。学员的对外身份是工人,教员的对外身份是工厂经理

或工程技术人员。12月17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被特务包围,张沈川等20余人不幸被捕。其间,学员谢小康趁敌人不备,将二楼前屋窗帘的右角拉开,发出“有情况”的暗号。伍云甫走到弄堂口,看到二楼窗帘已打开,就转身离开。不久,外出办事的涂作潮即走到门口时也发现了情况,他机智地提起路边的一个油漆桶,从特务面前从容走过,没有被敌人发觉。

张沈川等人被捕后,面对敌人残酷折磨和威胁引诱毫不动摇,保守了党的机密。1936年秋,张沈川等经党组织营救出狱(陈宝礼、麦建平、张庆福、谢小康4位同志先后在狱中牺牲)。

1931年1月,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由曹三筹建新的电台,同时,派涂作潮、伍云甫到江西。不久,中共中央又派遣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前往鄂豫皖根据地,派胡杰生等到湘赣西根据地,开展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同年1月3日,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完好地缴获了敌人电台。红军总司令部便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台,由王净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接着,红军办起了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由于缴获的发报机功率较小,还不能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在5月的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又缴获了一部功率较大的电台。将这部电台改装后,9月,中央苏区同上海的中共中央实现了直接通报。

几乎与此同时,毛齐华等在上海建立起的国际台也开始正式收发报。而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的同志,利用1931年12月间红四方面军缴获的敌人电台,很快同上海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军团实现了通报。湘鄂赣和闽浙赣根据地的电台也于1932年先后开通。

敌人“心脏”传出红色电波

1929年12月下旬,中央特科派钱壮飞打入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内部,成



张沈川

为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徐恩曾企图扩大势力,在各地建立特务分支机构,要钱壮飞负责“补充人员,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电台”。钱壮飞将计就计,将一批我党的情报人员和秘密交通员安插进敌人的特务机构。不久,国民党情报系统在南京、上海、天津的秘密电台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了。

徐恩曾虽然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重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钱壮飞发现徐经常出入上海舞厅“享受生活”,在秘密布置后,钱壮飞陪徐去歌厅跳舞,在他换衣服时,把密码本取出,让事先埋伏的同志迅速拍照后送回。得到密码本,对钱壮飞的地下工作有了很大帮助:此后他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对有价值的部分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送上。同时,这份密码本也被送到了红军手中。国民党党的“围剿”计划刚刚制定,其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中共中央和苏区。

顾顺章叛变后,特务机关向南京连发5封电报。此时正值徐恩曾去上海“享受生活”。钱壮飞收到电报后,用密码本将其全部译出,并立即向中共中央发出警报。接到情报后,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即全部转移。

12月,国民党十七路军在宁都起义,起义的报务人员为红军带来了更多的电讯器材,红军的无线电通讯队伍随即迅速扩大,并成立了以王净为局长、伍云甫为政委的通讯联络局。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训练班,很快由一个发展到几个,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通讯学校,还成立了保养、修理和装配收发报机的材料厂。到1933年,瑞金通讯学校学员在学人数已達千余人。此后,中央苏区把自己培养的报务人员源源不断地派到新的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我华野部队痛歼国民党“袖珍王牌军”

梅明凯

1946年7月苏中战役打响后,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我华中野战军从容迎敌,连连告捷。李堡战斗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野部队:“苏中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组织几次作战……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并勉励我华中部队:“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接到军委电示,我华野首长极为振奋,决心再显身手。

当时国民党军难以继续全面进攻,不得不调整部署:东面重点扼守南通经如皋到海安的公路干线,西面由扬州沿运河北上进攻邵伯、高邮,正面加强海安至泰州线以南占领区的“清剿”和防御。南通、如皋一线兵力比较薄弱,是其暴露的侧翼。对此,我华野首长设想,如果避开正面,攻其侧翼,在南通、如皋之间打开缺口,必将严重威胁敌人的后方基地,打乱敌人的部署,造成歼敌良机。

8月20日晚,我华野部队主力按照既定部署,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侧后空虚之际,以第一、第九军分区部队佯攻黄桥,进逼南通,迷惑敌人;主力第一师、第六师和第五旅从还如、如皋东侧隐蔽南下,于8月21日夜间到达丁堰、林梓地区,对守敌发起突然攻击,以一师攻丁堰、六师攻林梓。

丁堰、林梓是南通至如皋公路上的两个集镇,位于国民党占领区东面封锁线中部,驻有交通警察总队6个大队和第六旅1个营约3700多人。交通警察总队号称国民党的“袖珍王牌军”,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忠义救国军”和上海税警团改编,受过“美式训练”,配备有美式武器,归“军统”指挥。

我一师以第三旅第七、第八两个团投入了丁堰战斗,主力集结在韩家庄等地区,准备歼灭如皋来援的敌人,并相机歼灭陈草籍的敌人九十九旅。守敌对我华野部队的到来毫无察觉,仓皇应战。激战至22日上午10时,丁堰守敌除一个大队逃往东陈镇外,其余全部被歼。陈草籍的敌人不敢来援,向如皋逃走。与此同时,林梓守敌被我六师包围、歼灭大半。我攻击队立即开始战场喊话,进行政治攻势,守敌纷纷缴械投降,少数残敌企图跳河泅渡逃遁,均被我军击毙在河内。我第五旅乘胜扩大战果,于23日拂晓以一个团兵力攻击东陈镇的敌人两个交警大队,歼敌一部,残敌逃往如皋。

此战,我华野部队主动出击,攻克了丁堰、林梓、东陈等据点,共歼国民党交通警察总队所属5个大队和国民党军二十六旅1个营(毙伤敌1500余人,俘敌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轻重机枪130余挺,完好无损的美造十轮卡车7辆,彻底打开了我华野主力西进泰州、扬州作战的通道。



新四军除夕夜拔除延陵敌据点

吴小龙

1939年,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敌后,开辟茅山根据地后,延陵镇上的日伪军据点成为新四军东进北上道路上的障碍。第一支队首长把拔除该据点的任务交给了二团一营。

据侦察员报告,延陵镇据点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连,共30多人,日军营房在一座由大庙改建的仓库内,伪军分驻于镇西和镇东。经研究,一营营长张经秀决定于2月17日除夕之夜趁敌人守备松懈之际,率部夜袭延陵。2月17日晚7时,张经秀率一营战士冒着雨雪向延陵镇秘密进发。部队经七八十里急行军,赶到镇外埋伏。夜11时左右,随着张经秀一声令下,部队按照既定部署,分三路悄悄潜入镇内。

此时,守卫在外围楼楼里的伪军刚吃过年夜饭,不少人已经喝得醉倒在地,其他的家伙聚集在一层赌博,根本无人放哨。战士们摸到楼楼下面,将事先准备好的云梯架在墙壁上,一个接一个地爬上炮楼顶,然后进入三层、二层,缴获了敌人的机枪,再举着机枪下到一层,向赌博的伪军们大喝一声:“不许动!”伪军们吓得目瞪口呆,乖乖地举手当了俘虏。

与此同时,一营部分战士发起了对伪军另一座炮楼的攻击,同样将里面的敌人俘虏。但在收缴枪支的时候,一个伪军由于胆怯,不小心触动了扳机,导致步枪走火。不久,昌国寺的日军打电话来问情况,一营战士命令负责接线的伪军向日军回答说:“哨兵喝醉了酒,把

枪弄走火了!”日军听后,信以为真。在消灭了伪军后,张经秀下令部队向部署在仓库周围的日军工事发起进攻。一营各部很快打掉了敌人的前哨地堡,但日军利用仓库的牢固工事和优势装备进行顽抗。

新四军一面猛掷手榴弹以压制敌人火力,一面找来两桶煤油和柴草,实施火攻。一营战士多次点火,但由于大庙基座太高,院墙坚固,整个大庙和仓库又被厚厚的雪所覆盖,因此多次点火也无法烧毁。后来,有战士找来木竹竿,将柴草点燃后挑起扔进院内,引燃了敌人堆放的弹药,终于将敌人逼离了围墙。

一营指战员随即展开挖掘,将围墙挖开几个洞,突击队员从四面八方冲入围墙,和院内的日军展开白刃战,很快消灭了院内的敌人。随即进入仓库,与里面的残敌展开战斗。仓库里的敌人慌了起来,准备突围。被埋伏在外面的一营战士用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残敌拼死突围,逃到大庙北面的河边,企图通过河上的木桥过河,却遭到新四军密集的射击。这股敌人只得改变方向,逃到一处河面较窄处,企图涉水逃走,结果被追来的二营战士一阵射击,全部毙命于河中。

战斗结束后,张经秀立即带领战士们打扫战场。在大年初一清晨,押着日伪军俘虏,携带大批战利品撤离了延陵。一支队首长得到一营胜利归来的消息后亲自赶来迎接,并表扬他们说:“打得好,你们做了一件好事,让老百姓可以过一个安稳的年了。”



孙中山指挥炮击莫荣新

常红

1917年7月,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8月,南下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并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当时控制广东的桂系军阀表示“欢迎”孙中山护法,只是为借助护法力量,确保两广地盘,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向湖南扩张势力。为了顾全护法大局,孙中山对桂系军阀作了许多让步和忍耐。但桂系军阀在得到北洋政府的一些“让步”后,立即提出停战议和,引起孙中山的愤怒,指出桂系军阀的“议和”完全是“自便图私”,并要求西南各省继续“合力讨逆”。为防止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势力增强,确保广东地盘控制在自己手中,桂系军阀拒绝由广东省承担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企图迫使军政府“自生自灭”。

12月,桂系军阀莫荣新成为广东代理督军后,遂增收捐税,纵容部下到处开设烟馆、赌场,搞得民不聊生。广东各界群众团体及知名人士纷纷向孙中山请愿,要求惩办莫荣新。对军政府,莫荣新更是采取暴力手段,“只许自灭,不许自生”。他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将追随孙中山到广州参加护法运动的一批军事骨干拘捕下狱,又纵容部

下随意逮捕、杀害军政府委派的军官、各县招兵入伍乃至孙中山卫队成员。孙中山十分痛恨桂系军阀对军政府各项措施的阻挠破坏和莫荣新的种种倒行逆施,决定予以严厉惩治。

1918年1月3日,孙中山力排众议,以大元帅名义,下令护法海军舰队“同安”“豫章”两军舰会同驻广州的地方实力派军队,举行驱逐莫荣新的联合军事行动,以“举公道,伸不平,而使军政府自辟其生路”。面对地方实力派将领的阻拦,孙中山回答说:“吾为民除害,今即以身殉民,分也;汝师不助我,或反助敌,听君自择,吾无介焉。”

1月4日凌晨,孙中山亲自率领亲信将领和部分卫士登上“豫章”“同安”两艘军舰,在二沙头、大沙头炮击了桂军炮阵地和军管后,又向莫荣新的督军署驻地观音山炮台,“一连发50多弹”。莫荣新惊慌失措,“一面令将观音山灯光完全熄灭;一面下令军队不得妄动,不得还炮。”

孙中山亲自指挥的这次炮击行动,虽然未能给莫荣新以致命打击,却重挫了桂系军阀的嚣张气焰。第二天,非常国会第二副议长吴景濂、王正廷及军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等为调解人,前往大元帅府与孙中山商谈解决冲突办法。孙中山态度坚决,提出莫荣新“必须尊重大元帅、军政府及非常国会”等要求。4日下午,莫荣新来到大元帅府面见孙中山“谢罪”,并表示今后“大元帅有命,我一定服从”。

贺龙在1928年春节前后

贾晓明

1927年秋收暴动后,鄂中和鄂西地区参加暴动的农民武装,有的分散隐蔽,有的继续坚持斗争。参加南昌起义的贺龙部师长贺锦斋到监利、石首一带活动,召集旧部,组建一支100余人的游击队,在荆江沿岸开展游击战争。

贺龙、周逸群于南昌起义军南征受挫后,辗转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在湘鄂西地区发动武装斗争的建议。1928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湘西北特委,以郭亮为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后因郭亮另有任务,改由周逸群任特委书记。

1月15日,贺龙、周逸群等抵达武汉,他们正准备离开武汉时,巧遇贺锦斋的交通员,得知贺锦斋正在监利反哺活动后,贺龙、周逸群率史施元、卢冬生等10余人于18日租了一艘小汽船溯江而上,去和贺锦斋部会合。20日,小汽船经过监利县观音洲,贺龙从船工处得悉该地驻有一股团防,队长叫萧仪卿,当即决定停船“拜客”。萧仪卿见小火轮靠

岸,又见船上客人打扮阔绰,忙吆喝团丁列队迎候。贺龙上岸后疾步趋前,一把抓住萧的手腕,告诉他:“我是贺龙,找你借几支枪!”萧早就听说过贺龙的威名,吓得动弹不得。旁边一个团丁刚想举枪反抗,就被卢东生一枪打倒。其余团丁见状,全部乖乖缴械投降。经清点,贺龙等共“借”得步枪6支、驳壳枪4支、子弹200多发。

21日,贺龙一行在监利反哺与贺锦斋领导的游击队会合,两部会合后共有170多人,100多支枪。会合后,贺龙等决定暂留此地,派人向当地党组织进行联络。23日正值春节,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带了一些粮食、银圆,向当地贫苦农民和渔民拜年,并做调查工作。

在和群众谈话中,贺龙、周逸群了解到:当地有个李姓恶霸,不仅豪养一批家丁横行乡里,还勾结土匪绑架勒索、奸淫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深受其害。和周逸群研究后,贺龙决定去“给这个大恶霸拜年”,为民除害。

25日(农历正月初三),贺龙率10多人来到李家,正在饮酒作乐的李姓恶霸以为是土匪来了,忙令家丁迎客,还端出银圆,口称:“兄弟一点意思,请各位大哥接风。”贺龙道:“姓李的,老子是共产党贺龙,今天不要你的钱,只要你的命!”李闻言还想抵抗,被贺龙当场击毙,家丁也被战士们缴了械。

除掉恶霸的第二天,贺龙一行前往监利县下车湾,遇到了南昌起义时在贺龙部队任庶务股长的潘锦成,通过潘锦成,很快与中共鄂中南特委及监利、石首、华容等县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贺龙、周逸群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分析了荆江两岸的斗争形势和群众情绪,决定湘西北特委暂时留在鄂西和湖北地区,参加与领导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在打开局面后再赴湘西北,并决定将鄂中南特委、石首、华容等县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武装与贺锦斋游击队集中起来,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十九路军,贺锦斋任军长,由贺龙统一指挥。